

跑腿代购“止痛药”构成贩卖毒品罪

浙江法院:从严打击涉麻精药品等犯罪

实习生 蓝听宇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高媛萱

本报讯 帮别人跑腿代购“止痛药”,结果成了贩卖毒品?在第37个“6·26”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浙江高院召开第十次毒品犯罪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专门介绍浙江法院2021年以来审理麻精药品、“笑气”等犯罪案件情况,并发布十大典型案例。

2019年,周某某在治疗肾结石时,对麻精药品产生药物依赖,频繁开药,后被医院发现,不予配取药物。于是,他找到了职业跑腿人富某某,约定在正常跑腿费的基础上,再每单加几十元不等的跑腿费,让富某某编造结石痛、腰痛等急需麻精药品止痛等理由,去医院开出麻精药物后交给他注射。2020年

1月至2022年3月间,富某某为周某某共计开具地佐辛注射液、盐酸曲马多注射液115次,获取“跑腿费”5580余元。青田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富某某以牟利为目的,多次贩卖国家规定管制的麻精药品,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情节严重,一审判决富某某有期徒刑4年3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

“麻精药品具有双重属性,在正常发挥医疗效用时属于药品,被滥用时则成为毒品。”发布会上,浙江高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薛海华介绍。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将麻精药品作为传统毒品的替代物进行贩卖、吸食,社会危害很大。浙江法院坚持从严惩治麻精药品流入非法甚至涉毒渠道的犯罪活动。2021年以来,共审理涉麻精药品刑事案件97件,占全部毒品案件的4.14%,审理非法销售

“笑气”案件115件,非法销售含有禁用物质的减肥产品案件30余件。其中“笑气”类案件占比最高。薛海华介绍,“由于年轻人没有认识到‘笑气’具有与毒品一样的危害,被称之为‘奶油气弹’‘快乐气球’而滥用。浙江法院对非法生产、销售‘笑气’的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此外,案涉麻精药品种类呈扩增趋势。在司法实践中,浙江法院对出于非法目的购买、销售、制造麻精药品的行为,以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于行为人明知是国家管制的麻精药品而向他人的饮料、食物中投放,欺骗他人吸食的,以欺骗他人吸毒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为实施猥亵、强奸、抢劫等犯罪而欺骗他人吸食麻精药品的,按照处罚较重的罪名追究刑事责任。

“水分子”出征

近日,作为浙江水利水电学院首支出征的暑期实践队伍,“水分子”小队来到南浔菱湖镇、和孚镇,用直播镜头聚焦湖州公安生态警务。

通讯员 水分子 摄



全国行政审判行政复议工作同堂培训班在杭开班

本报记者 肖春霞 通讯员 刘才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共同促进法治政府建设,6月25日,第二届全国行政审判行政复议工作同堂培训班在杭州开班。全国行政复议机构行政复议人员、全国法院系统行政审判法官、国务院有关部门行政复议行政应诉人员200人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由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举办,围绕加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配合、贯彻实施新修订的行政复议

法、提升重点领域行政执法水平、做深做实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等内容进行。

培训学员们纷纷表示,将珍惜此次学习机会,加强交流,相互借鉴,在今后的工作中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断提升政治理论素养、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践行法治为民,切实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

浙江是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的率先实践地。2015年,全国首家行政复议局在义乌设立;2016年7月,浙江挂牌成立全国首个省级行政复议局;到2019年6月,省市县三级行政复议局实

现全面运行,集中履行本级政府行政复议职责。中央启动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后,浙江又开展了为期三年的行政复议规范化建设,推动行政复议局从“有形挂牌”向“有效运行”转变。2023年所有市县新收行政复议申请超过一审行政诉讼案件数,复议诉讼比达到2.3。今年以来全面保障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贯彻实施,加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衔接,深化行政复议主渠道建设,做好相关制度的立改废,1—5月份,全省新收行政复议申请1.45万件,复议诉讼比达到2.8,再创新高。

针对矛盾纠纷预防和多元化解,杭州立法进行时

本报记者 胡宗昊

本报讯 25日,杭州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了《杭州市矛盾纠纷预防和多元化解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

近年来,杭州矛盾纠纷预防和多元化解工作实践中,建立了“民呼我为”工作体系、“141”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成“浙里调解”、浙江解纷码等数字应用,推进了矛盾纠纷预防和多元化解工作的系统化、智慧化、数字化。对这项工作进行立法,是有效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和固化,是构建具有杭州特色、适应杭州发展的城市治理体系

的现实需要。

对于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来说,从源头上进行预防、早发现早处理,成效最大、成本最低。对此,《条例(草案)》提出,政府及其部门、法院、检察院应当按照相关职责分工开展警源、访源、诉源、检源治理工作,将矛盾纠纷预防贯穿于重大决策、行政执法、司法诉讼等全过程。同时,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组织推进“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建设,发挥法律援助机构、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司法鉴定机构、仲裁机构、法学会等基层服务站点的作用,为公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公共法律服务,充分发挥公共法律服务在矛

盾纠纷预防中的基础性功能。

《条例(草案)》坚持非诉讼化解优先理念,突出调解先行,提出要构建多元调解工作格局,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律师调解、商事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等有机衔接、协调联动,各有关国家机关和组织、个人共同参与的多元调解工作格局。

在保障方面,《条例(草案)》主要规定了工作经费保障、调解员待遇保障、调解员能力保障等内容。在履职监督方面,《条例(草案)》构筑了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于一体的监督体系,确保相关单位依法履行矛盾纠纷预防和多元化解职责。

“身上的这身警服,就是答案”

(上接1版)

在禁毒队里,黄宾是挑大梁的,专治各类“疑难杂症”。今年初,警方得到一条线索,萧山有人贩毒,这批人行事隐蔽、分工明确,只用现金交易。警方通过侦查,大致明确了作案团伙,但一直没有实质性突破。“要不让黄宾来试试。”萧山区公安分局禁毒大队相关负责人说。黄宾果然在犯罪嫌疑人的支付宝交易记录中找到一条关键性线索——犯罪嫌疑人有条某天凌晨5点的高速扣费记录,是从四川某地到浙江的。很快,警方根据这条线索,锁定了远在四川的上家。

“胆小”与“胆大”

黄宾的母亲怎么也没想到,儿子会成为一名警察,而且是游走在刀尖上的禁毒警察,“他从小就胆小,以前上学的时候,同学们闹着玩,争相跳过一条水沟,就他站那里不敢跳。”

黄宾成为警察后,母亲一直放心不下,黄宾对她说:“我现在是警察,如果我都怕,那谁来抓那些犯罪分子?”

杭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相关负责人还记得,有次为了抓捕一名涉毒人员,黄宾跳窗追了出去,在不知对方是否携带武器的情况下,硬是追出2公里路,将对方摁倒在地。

禁毒民警面临的危险,不仅是毒贩可能上来火拼,涉毒人员不少还身患艾滋、开放性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2024年,在一服务区,警方截获一辆黑色轿车,车内可能藏有毒品。警方随后控制了车上的2名嫌疑人,黄宾开始搜车。“警官,你过来一下。”黄宾闻声望向其中一名嫌疑人。“有啥事你直接说。”黄宾说。但嫌疑人执意要黄宾过去才说,“你靠近点,我单独和你说。”

“说真的,当时心里有点打鼓,怕他突然咬我一口之类的。”黄宾事后说。当时,他犹豫了一下,还是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大着胆子把耳朵贴了过去。“你不用翻了,毒品藏在后排中间的扶手箱里。”嫌疑人轻声说,黄宾能明显感觉到对方嘴里呼出的热气。

都说“江山可移,本性难改”,生活中“粗心”又“胆小”的黄宾是怎么在工作中变得“细心”又“胆大的”?黄宾想了想,说:“身上的这身警服,就是答案。”

(上接1版)

舟山市司法局联合交通部门,全域推进“法治方舟”海上普法工作,在全市主要客运场站、船舶融入公共法律服务元素,创新随船法律服务,推动“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向海上延伸;坚持特色引领、需求导向,创新建立了海上融治理中心、海上航行司法所、乡音调解工作室等公共法律服务新模式,让“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的法律服务更加精准有效。

普陀某鱿鱼钓船船东通过手机在浙里办“公共法律服务专区”找到了“15分钟”范围内的普陀区海上融治理中心。原来,该船四方产权人因3000余万股份转让合并问题产生激烈矛盾。中心凭借专业、综合的法律服务,仅10日就成功调解了这起复杂的纠纷案件,体现了“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的速度与效率。

定海在新居民聚集的公共法律服务站点设立了“乡音调解工作室”。近日,新居民李某为定海区盐仓街道公共法律服务站的老葛送上了一面锦旗。李某和丈夫是河南籍外来务工人员,前不久丈夫在船厂工作时突发意外死亡,李某通过“12348”法律服务热线找到了“15分钟”范围内的“乡音调解工作室”。工作室主任老葛接手后,多次与企业联系沟通,掌握争议焦点,梳理赔偿事项、赔偿标准等,提出了合适的调解意见和赔偿方案,最终顺利化解这起纠纷。

此外,为了更好地解决在舟游客的法律需求,舟山市司法局还探索建立“公共法律服务+景区”一站式服务机制,并在普陀山等风景名胜区内设置了专为景区定制的公共法律服务桌面终端机。如今,在舟游客也能在“15分钟”内享受到高效便捷的法律服务。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0571-85310013